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拜 倫

人 民 出 版 社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拜 倫

伊瓦士琴科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1583

倫

著者：伊瓦士琴科

譯者：臧民出 版 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華書店

北京新華印刷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335.61
79

00 一九五四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00 一九五四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喬·戈·拜倫

畫家山德爾斯作

喬治·諾埃爾·戈登·拜倫（一七八八——一八二四年）是英國詩人，十九世紀革命浪漫主義最傑出的代表人物。

十九世紀頭幾十年間，英國浪漫主義革命思潮的形成，乃是由於英國國內的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化與工人階級伴隨着工業革命而開始出現於政治舞台的結果。十九世紀初整整的十年當中，工人騷動年年發生，從諾丁甘的工人暴動（一八〇〇年）到曼徹斯特的織工與廠主間的流血衝突（一八〇八年），從一八一〇至一八一一年的屢次罷工事件到設斐爾德、里子、斯托克波特、曼徹斯特、約克郡等地機器破壞者的羣衆運動（一八一二年），一次比一次劇烈。人民的騷動風起雲湧，它的規模和激烈性都到了空前的地步。除了這些基本矛盾（階級矛盾）之外，在英國還存在着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能解決的一些矛盾：民族矛盾（愛爾蘭人遭受壓迫）、殖民地矛盾（對美國作戰失敗）、內政矛盾（腐朽的議會制）、宗教矛盾（排斥天主教徒），這些矛盾都尖銳化起來了。古老歐洲的人民

也行動起來了：意大利、西班牙、希臘的人民紛紛起來同異族壓迫和封建反動勢力進行鬥爭。產生英國的革命浪漫主義並賦予它以非常的規模、複雜性和顯明的戲劇性的歷史環境，就是這樣的。

一七八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拜倫誕生於倫敦一個古老的、貧寒的貴族家庭裏。他先在哈魯公學讀書，後來進了劍橋大學。一八〇七年拜倫的第一本詩集「優閒的時光」出版，一八〇九年爲了答覆人們對這本詩集的批評，他發表了諷刺詩「英格蘭詩人與蘇格蘭評論家」，用以攻擊「湖畔」詩人的反動的浪漫主義；這派詩人背棄了啓蒙學派的理想，誦媚地歌頌統治制度和教會。拜倫同文學上和政治上的反動勢力進行的不調和的思想鬥爭，貫穿着他一生的活動。由於有了拜倫的作品，具有巨大社會意義的題材就滲入了英國的浪漫主義。

一八〇九年拜倫到東方旅行，他訪問了葡萄牙、西班牙、阿爾巴尼亞、希臘、土耳其。一八一一年詩人回到祖國，發表長詩「柴爾德·哈羅爾德的巡遊」的第一、二兩篇（一八一二年），這是以旅途中得到的印象寫成的。

「柴爾德·哈羅爾德的巡遊」第一、二兩篇反映着英國社會生活的特徵和詩人在旅

行期間接觸到的歐洲某些民族的生活特徵。拜倫歷年積累的各種各樣深刻的觀察，使得他能够在敘述中自由而廣泛地加以發揮。柴爾德·哈羅爾德這個人物，是拜倫的詩中第一次創造出的憂鬱漂泊者的形象。拜倫詩中的主角敏銳地意識到特權社會存在的空虛和無益。構成這篇長詩的感人力量的、尋求「另一個環境」的主題，在兩個方面得到了解決：一方面是求之於和諧美麗的、善於治癒創傷的大自然，另一方面是求之於精神力量和健康的純真的源泉——爲榮譽和自由而鬥爭的各族人民。拜倫歌頌着手執武器奮起反抗拿破崙侵略者的人們西班牙的英雄們，同時熱情地號召希臘人擺脫奴役者的枷鎖。內容的新穎嚴整、提出的問題的社會意義、豐富的抒情詩情調，說明了這篇長詩前兩篇的巨大成功。甚至反動的批評家們也不敢抹煞拜倫的才華。

然而，當拜倫並不滿足於他對外國暴政的揭發，轉而攻擊本國政府的時候，他們的態度便突然改變了。拜倫成年時，便在貴族院承襲了依繼承權應屬於他的席位。他的第一次演說（一八二二年），就是針對着判處破壞機器者以死刑的議案而作的；所謂破壞機器者，就是那些破壞新近裝設的機器的工人們，他們認爲這些機器是他們失業和貧窮的原因。青年演說家憤怒地問道：「難道說，鋼鐵和鮮血在什麼時候治好過顛沛困苦、嗷嗷

待哺的人們的創傷？」拜倫作了這次演說之後，在貴族院又發表了兩次演說，不久他就明白了，無聊的「昏睡病」和「賣身求榮」在這所「病院」裏佔着上風，便決意「不再在這個舞台上顯身手」了。

可是，拜倫關於當代生活中的迫切問題所作的最初幾次演說，却預先決定了他以後的創作的性質。拜倫開始在某些詩篇裏，發表自己對政治的見解，這些詩篇使官方的文丐們感到十分憤慨（獻給破壞機器者的兩首小詩：「議案起草人頌」、「破壞機器者之歌」，諷刺反動的政治家的短詩等等）。

拜倫在三年期間內（一八一三——一八一六年），除寫了一些政治抒情詩之外，還寫了所謂東方詩集：「異教徒」（一八一三年）、「阿比多斯的新娘」（一八一三年）、「海盜」（一八一四年）、「娜拉」（一八一四年）、「柯林斯的圍攻」（一八一六年）、「巴里西納」（一八一六年）；這些詩篇同樣表達了他對當時現狀的反抗情緒。拜倫創作「東方詩集」的年代，正是英國國內外反動勢力猖獗的時期；所以詩人在這些詩篇中唾棄當時的一切社會制度。「東方詩集」中到處碰壁的、被一切人遺棄的孤獨主角的形象，與整個社會成了鮮明的對比。所謂拜倫式的英雄，在這些詩篇裏完全形成了，拜倫式的英雄認為只有

無政府主義的個人自由和不妥協的孤傲才是他的出路。別林斯基就詩集中的這種英雄評論拜倫著作的話是十分中肯的：「……這是一個對一般事物都憤慨激昂而在自己驕傲反抗的時候只依靠自己的人的性格。」（「別林斯基文集」，一九四八年俄文版，第一卷，第七一三頁）普希金在長詩「茨岡」中利用阿列克的形象，揭露了「拜倫式的英雄」的無政府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真面目。偉大的俄國詩人處理類似的題材的精神，是與「東方詩集」相反的：他顯示了只貪圖個人自由、毫無道德的人自私自利的天性。普希金藉着茨岡老人的口吻說道：「你只是爲了自己而尋求自由……。」

在當時的英國現實中，英雄和「羣氓」不可調和的衝突後面，包含着尖銳的社會矛盾。這些詩篇是精神危機的表現，這種精神危機是由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解放理想在實踐上的幻滅和「頑固的保守黨人」的專制統治所造成的。

拜倫的著作在這個時期就已充滿了尖銳的矛盾。其中無政府主義個人主義情緒與高貴的公民熱忱交錯着，對社會進步的可能性及人類生存意義本身的深深失望與反抗反動勢力的强大呼聲交錯着。按照恩格斯的說法，這些矛盾產生於「……除封建貴族與資產階級二者之間的矛盾以外，還存在着一般的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富裕的游惰者與勞動的

貧窮者之間的矛盾……」的時代（恩格斯：「反杜林論」，三聯書店一九五四年版，第五頁）。對普遍矛盾加以研究，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到拜倫的著作是在哪種客觀歷史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的一切主觀特徵是什麼。

反動的英國社會人士利用拜倫的社會見解和文學主張的尖銳政治性質來攻擊他，他們還藉着詩人同妻子感情破裂的口實使他在祖國處境十分難堪；一八一六年拜倫不得已離開了英國。他到了瑞士，遇見雪萊，後來便僑居於意大利（威尼斯、羅馬、波倫亞、拉溫那等地），並積極參加了意大利燒炭黨人的民族解放運動。

拜倫在瑞士寫成的哲學詩劇「曼夫雷德」（一八一七年），是一部完成他的創作第一個階段並給他以後的創作開闢道路的作品，這篇詩劇的悲觀主義情緒達到最高的悲劇表現。英雄的悲觀主義基礎上面，存在着現實的歷史根源：啓蒙與革命的理想體現在醜惡的資產階級實際中的事實，封建和宗教的反動勢力的滋長。曼夫雷德對人生和人類都感到失望，所以他懷疑知識的成果，他以為知識只能帶來痛苦。他過着高傲孤寂的幽居生活，內心充滿了對「平原上」碌碌衆生的命運的鄙視。可是，曼夫雷德同時却具有一種任何反動勢力都不能摧毀的堅毅剛強精神。拜倫在長詩「犀龍的囚徒」（一八一六年）

中，歌頌了獻身於爲爭取祖國政治自由的鬥爭的日內瓦公民龐尼瓦（十六世紀）的英勇事蹟。拜倫在同一時期創造了普羅米修士的形象（「普羅米修士」）不是偶然的，這是在同「壓迫人類的」一切惡勢力的鬥爭中不屈不撓的勇敢精神和堅強意志的體現。拜倫所歌頌的普羅米修士和曼夫雷德，都同樣是精神偉大和意志堅強的榜樣。拜倫在這裏讚美這個英雄，因爲他

「在堅決抗擊野蠻的惡毒中間，

在不屈不撓的偉大靈魂裏面，

遺留給我們強大的榜樣，

天上人間的一切暴風雨

都不能把他這個靈魂摧殘。」

（「普羅米修士」）

拜倫創作的第二階段比較不太重要的作品中值得舉出的有幾首小詩，長詩「馬塞巴」（一八一九年）、「島」（一八二三年），詩劇「薩達那培拉斯」（一八二一年）。還有一些充滿着深厚的真情實感的抒情詩，在拜倫的著作中也佔着顯著的地位。像「我的心靈沉

悶啊」（萊蒙托夫譯成俄文）、「她真華麗」、「詠八月」、「致八月」、「訣別」、「永別了」等詩，都是很出色的。

意大利之行，親身積極參加反抗奧地利奴役者的民族解放運動，英國人民大眾鬥爭的高張（拜倫密切地注意着這個鬥爭的命運），這一切都是詩人的天才重新蓬勃發展的先決條件。詩人在拉溫那的住所會給燒炭黨人貯藏軍火。詩人準備直接參加反對意大利人民奴役者的起義。拜倫僑居意大利時期的著作中的形象，標誌出熱情的奔放和哲學思想的深刻。拜倫爲了鼓舞當時意大利人民進行忘我的鬥爭，他在「但丁的預言」（一八二一年）、「塔索的悲嘆」（一八一七年）、「威尼斯頑」（一八一九年）、「柴爾德·哈羅爾德的巡遊」第四篇中，重新喚起對意大利的偉大過去的回憶。

對政治的滿腔熱情也貫穿在取材於聖經的哲學詩劇「該隱」（一八二一年）中。在這個詩劇中，拜倫創作的矛盾達到了最高的表現。早在「曼夫雷德」中已經明確了的「塵世煩惱」的主題，在「該隱」中深刻化了，這種主題是到了絕望地步的對萬物的懷疑，接近虛無主義的極端的懷疑論。可是同時拜倫從革命啓蒙思想的立場指出，與這樣的生活妥協，對英雄來說簡直是不可能的，而且這樣的生活更不能以理智的方式加以說明；於是

他唾棄了經不住理智考驗的一切，揭露了蘊藏在神話濃霧中的無稽之談；因此，他便肯定了無畏的人類思想的偉大，這種思想力圖接近「物體的根源」。這篇激烈反對上帝的作品包含着無神論的見解，否定上帝的神通，否定操縱人們命運的神權，否定上帝的本身存在。拜倫這篇長詩廣泛的哲學內容和該隱及阿涅爾的形象後面，隱藏着迫切的政治意義，包含着對宗教的反動的、反社會的作用與對那些旨在加強人們對現狀和「命運」的屈從的宗教神話的抗議。貫穿於整篇詩劇的中心主題（關於人的生存意義），在它的結局中具有特別的悲劇緊張性。該隱帶着這個未解決的問題到流放所去了。拜倫搜集了一些鬥爭材料，意大利人民、希臘人民以及他以自己的著作來服務的英國人民爲爭取權利和自由與反動派進行鬥爭的材料，可見拜倫正在謀取這個問題的解決。

拜倫與意大利解放運動的密切關係，激發了他對意大利的歷史研究的興趣。拜倫寫了「馬利諾·法麗埃羅」（一八二〇年）和「兩個佛斯卡利」（一八二一年）兩部歷史悲劇。第一部悲劇充滿現實的政治內容，雖然它的情節是從十四世紀意大利歷史中借用的。這部悲劇的中心人物是威尼斯總督馬利諾·法麗埃羅，他領導着一個秘密組織去反抗反人民的當權集團。悲劇同燒炭黨人運動的命運的聯系是顯而易見的。富有生動的政治鬥

爭內容的拜倫作品中，出現了熱烈的對祖國之愛的愛國主義情感，拜倫在悲劇「兩個佛斯卡利」裏用巨大的戲劇力量表達了這種情感。值得注意的是拜倫早在「柴爾德·哈羅爾德的巡遊」的頭幾篇中，已經展示了對祖國之愛的愛國主義題材，把它看成是真實的、與積極的反壓迫鬥爭相聯系的原則。熱愛祖國、矢忠祖國的力量，成為一個人的真正品格和真正偉大的標準。

與反動的「湖畔」詩人相反，拜倫是捍衛古典主義傳統的。他幻想創作一種「正確的」、即按照古典主義原則寫成的英國戲劇，這種戲劇充滿了思想性，並且可以激發讀者的公民情感。拜倫希望成為一位「嚴肅的共和國悲劇」的作者。拜倫利用了革命古典主義的傳統，並將它與反動浪漫主義者的複雜、晦澀的形式對立起來。拜倫捍衛古典主義「舊式」傳統的主要意義就在這裏。

拜倫晚年的政治諷刺作品的內容，包含着對束縛歐洲生氣蓬勃的社會力量的警察國家的鬥爭，對「神聖同盟」冷嘲熱諷的無情打擊，對封建統治及資產階級統治的反人民實質的揭發（「青銅世紀」，一八二三年；「判斷的幻影」，一八二二年；「唐·璜」，一八一九——一八二四年）。拜倫成為報道各國人民的政治自由和民族自由的信使：

「快點揮起手吧，打掉這個羅網！」

蜘蛛失掉了網，它的毒汁和螯刺就不可怕了。

人民，生存在世界上的任何人民，

不要遲延！挺起身來，把它從牆上扯去！」

(「唐·璜」，第九篇，第二十八節)

拜倫在「曼夫雷德」中以寓意式的描寫，刻畫出「世界第一等禍害」的代表者——阿里曼的形象；而在「青銅世紀」中，他却改用政治上鋒利的、根據具體歷史事實的諷刺方法，來抨擊「神聖同盟」和它的鼓舞者及領導人。拜倫揭發了維羅納君主會議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本質，這個會議的召開旨在擬定一種鎮壓歐洲人民運動的方案。在拜倫這篇諷刺詩中，表明了英國是一個殘忍地剝削人民的國家（人民理應「納稅和負債」），英國還是這樣的一個國家：那裏貪婪的土地佔有者——地主們把人民在同拿破崙作戰期間所遭受的災難和困苦變爲自己發財致富的源泉。拜倫在長詩「判斷的幻影」中，無情地譏刺、嘲笑了詩人蘇賽及與他勾結起來的英國反動勢力。

博大精湊的現實主義詩體小說「唐·璜」是拜倫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他創作道路

上的輝煌成就。在「唐·璜」問世之前，拜倫發表一篇詼諧長詩「別坡」（一八一八年），這篇詩便顯露了詩人的正在成長的現實主義才華。在「唐·璜」中，拜倫給唐·璜這個題材以新穎、獨創的變體。使拜倫感覺興趣的，與其說是實際上意義不大的主角本身，不如說是作品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爲使主角同大多數的人們和事件接觸起見，作者以極其巧妙的手法處理他漂泊中的一段情節。以前拜倫對這些問題用浪漫主義手法加以抽象地敘述，現在由於用現實主義手法闡述，所以在這部詩體小說裏，這些問題被提到極高的思想水平。這部小說描寫了西班牙青年唐·璜的冒險事件：從西班牙逃出，純樸的愛情，閨房的停留，參加對伊茲邁爾的襲擊，凱瑟琳二世王朝的供職，英國之行。按照拜倫的構思，唐·璜應該犧牲於法國革命的鬥爭中。拜倫原擬寫作二十四篇，但只完成了十六篇及第十七篇斷片。這篇長詩是有矛盾的，詩中也表現出拜倫憂鬱的懷疑態度及他對「人的本性」的虛無主義見解。爲文明、進步所培養的一切，彷彿從人的身上剝落淨盡，人成爲獸慾的奴隸。但是，佔優勢的並不是作品的這一面，而是形成感人力量和真摯力量的另一面。拜倫本人充分體現在「唐·璜」裏面——他是自由的信使，仗義執言的詩人，各國人民民族獨立的捍衛者，暴政和專制的敵人。詩體小說「唐·璜」的現實

主義，表現在對資產階級貴族的社會中社會關係的深入洞察，表現在對它的思想體系的謊言的揭發及對它的虛偽道德的暴露。這部作品的現實主義還揭穿了資產階級所崇拜的金錢萬能。拜倫對英國統治階級認為資本中體現着最高法律和正義這種道德上的卑鄙，予以痛斥。詩人以自己對人民的信心和對人民偉大的解放使命的信心，來對抗市儈、僞君子的無恥的、腐朽的世界。「唐·璜」表現了拜倫詩作各種各樣的天才；他的天才閃耀着無情的諷刺、命中要害的嘲笑的鋒芒，放射出高貴的公民熱情、深刻的抒情的自白的異彩。

詩人的死亡中斷了「唐·璜」的寫作。一八二三年，拜倫對希臘反抗土耳其壓迫者的鬥爭表示熱烈的同情，於是他參加了希臘軍隊。他用自己的財產裝備了一艘軍艦；後來又親自招募了五百名兵士，並供給軍服。拜倫顯示了卓越的組織才能，不倦地致力於希臘分散力量的統一及彼此不和的領袖們的團結。拜倫在自己的事業正在轟轟烈烈的時候，患了熱病，於一八二四年四月十九日在密索隆歧逝世。希臘宣佈拜倫逝世為國喪，來對他進行哀悼。

拜倫逝世之後，反動的英國報刊還繼續迫害他。在現時，資產階級文化腐朽的時代，英國資產階級文藝學家，以「純藝術」的心理論為依據，竟宣稱拜倫是「中等」詩